

鶴立「快活林」裡的嚴獨鶴

「讀人閱史」之七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名報人也是小說家的包天笑在《鈞影樓回憶錄》中談到報紙的副刊時，說：「記得北京某一家報紙出版副刊，劉半農寫了一個發刊詞，開頭便說：『報紙為什麼要有副刊？這個問題誰也回答不出，但有報必有副刊……』但我敢說副刊是一種自然趨勢，而且還受著小報的遺傳性。因為未有副刊之前，先有小報。最初的報紙，並沒有什麼副刊，可是我見到那些最早出版的報紙，在新聞之後，便有什麼詩詞雜文之類，不過當時是不分欄的，那便有了副刊的萌芽了。到後來可以說把小報的材料吸收了，取其精華，遺其糟粕，於是遂有《申報》的『自由談』，《新聞報》的『快活林』，《時報》的『餘興』與『小時報』。那時候，副刊便成為大報裡的小報了。」

上海當年四大報，《申報》最老，《新聞報》次之，再來是《時報》及《時事新報》。《新聞報》與《申報》在當時並駕齊驅，合稱「申新」，其各自的副刊《快活林》與《自由談》在當時也最負盛名。《自由談》的主編周瘦鵑；《快活林》的主編嚴獨鶴，在當時被稱為「一鵑一鶴」，一時瑜亮，聲勢之大，等同兩報的代名詞。時人玖君在《報人外史》中說：「嚴先生在新聞界的地位，一似梅蘭芳之於菊部，顧曲周郎，沒有不知梅大王的，讀報人士，沒有不知嚴主筆的。報紙副刊，畢倚虹賜嘉名曰『屁股』，嚴先生即以編輯屁股（《新聞報·快活林》）登龍，名滿全國，稱霸報壇……《申報·自由談》之鵑（現掛《春秋》欄名譽編輯之周瘦鵑），曾稱瑜亮外，他人無出其右。」

嚴獨鶴（1889-1968）名楨，字子材，別號知我、檳芳館主，獨鶴是他的筆名。關於這個筆名的由來，他的女兒嚴汝瑛說：「父親和我的生母原配盧氏蓉貞結褵，雖相聚時日不長，但伉儷情感甚篤，思念殊殷。後因父親青年時喪偶，他既感悼亡之孤獨，又想人生應有所作為。因此，從痛苦和奮發中，揮毫寫悼詞一篇，他為悼詞中的『不克雙飛，徒守獨鶴之身』句所啓發，決定以『獨鶴』為筆名，終生以之。」嚴獨鶴祖籍浙江省桐鄉縣烏鎮，卻生於上海。父親是上海製造局的文案主任。他四歲時，就在祖母與母親的指導下識字讀書。六歲後學於塾師金先生門下。九歲起從母舅費翼墀讀書，費氏為浙中名士，學問淵博，嚴獨鶴在此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。他聰穎好學，十二歲考中秀才，一時有神童之譽。十五歲入廣方言館習英文及數、理、化諸科，原本準備畢業後出國深造的，奈何在十九歲那年，其父不幸亡故，家境陷入窘迫，嚴獨鶴只得謀職以贍養全家。他先任教於上海南區小學，繼而又赴江西上饒廣倍中學教英



文。辛亥革命後，他回到上海，在兵工學校當了一年的文牘員。1913年入中華書局任英文部編譯員，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。1914年8月，嚴獨鶴應聘入《新聞報》，開始他長達三十餘年的《新聞報》副刊主編生涯。

《新聞報》的副刊開始叫做《莊諧叢錄》，取的是亦莊亦諧之意，內容比較駁雜，從南社詩詞到幽默笑話，從政論時評到長短小說，一應俱全。嚴獨鶴上任後將其更名為《快活林》，設置的欄目為〈諧著〉、〈小說〉、〈筆記〉和漫畫一幅，內容上力求雅俗共賞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在追求趣味性的同時，又兼顧了時代感。他說：「論副刊的性質，簡直是相容並包，要注意到世界國家、社會、家庭、個人各方面，從大事以至小事，隨時有討論的題材，要著眼於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教育、科技、藝術各部門，從正面以及側面隨時有寫述的資料。」而他每天撰寫〈談話〉一欄，刊登於《快活林》版面的首要地位，看似談天說地，漫不經心，實則綿裏藏針，充溢其間的是為真為善。後來也在《新聞報》工作的陳蝶衣認為〈談話〉「語多詼諧而不忘言責，蓋無異於東方曼倩之譎諫也。」而玖君在《報人外史》中這樣評價嚴獨鶴的〈談話〉：「當時報屁股，一本正經，不刊詩古文詞，便載風月文章，常識短篇，枯寂沉悶。嚴先生新硯初試，主持副刊，正牌掛出，每日〈談話〉開鑼戲，一似名伶壓軸，生旦淨丑，五音聯彈，精彩紛呈，叫座魔力，獲意想不到之效力。讀報者打開報紙披閱，不約而同，急找屁股上第一篇〈談話〉，看他老先生有何高見，什麼奇妙譬喻，麻將賭經如何設局，生花妙筆，寫成屁股文學，同道效顰。二十餘年來，副刊〈談話〉、〈閒話〉、〈小言〉第一篇文章，為編者應有之義，推源其始，嚴先生開山祖師咧。嚴獨鶴的〈談話〉文字深入淺出，一篇談話，如白居易詩老嫗都解，工商業小夥計，略識之乎。對於自命前進作家編輯的新屁股，普羅文學，民族文學，象牙之塔文學，的嗎呢吧，桀格搓呀歐化白話文，山東人吃麥冬，一懂勿懂。還是禮拜六派嚴先生平鋪直敘談話，如啖諫果，讀之醞醞有味。」

他的學生劉嘉猷在〈悼念嚴師獨鶴〉文中說：「報紙的副刊，謔者稱之為『報屁股』，似乎不為士大夫階級所重視，但當時的〈快活林〉則不然，主要是鶴師的一篇〈談話〉具有極強的號召力，因為〈談話〉的取材，往往揭開社會的醜惡面，針砭軍閥的猖狂，和權貴的乖行，而以冷嘲熱諷的筆觸出之，頗有皮裡陽秋之妙，使讀者像是著了迷一樣，一般市民上至閹閹名流，下至各行業的商店夥伴，翻開《新聞報》，均以先睹〈快活林〉為快。認為鶴師的〈談話〉，代表了讀者的心聲。……因此，我總覺得鶴師雖為〈快活林〉的一個園丁，但筆力雄偉，橫掃千軍，他的〈談話〉為新聞文學寫下了輝煌的一頁。他是一個沒有名流氣焰的文壇巨子，他的創作精神，鞏固了他在新聞界的地位。……他寫〈談話〉，下筆很是謹慎，字斟句酌，仔細推敲，所以每成一文，字字擲地有聲，乃能負全國輿論之眾望。當時金城銀行行址在江西路，與漢口路《新聞報》館址可謂近在咫尺，所以我在下午五時下班，總到《新聞報》編輯部去，那正是鶴師撰述〈談話〉的時候，文人吸煙原屬常事，但他的香煙癮實在太深，幾乎一支接一支的煙不離口，以致口唇被薰得發黃，連鼻尖也顯得微紅，有時文思沉滯，每喜用特

備的精製剪刀，修理指甲。〈談話〉撰成，即與副刊稿一併發排。」

後來成爲流行歌曲的名作詞人的陳蝶衣（1907-2007）回憶當年的情景說：「我於十五歲的那一年進入《新聞報》，佐家大人司筆札，供職於推廣部，閒暇之時曾嘗試塗抹，爲〈快活林〉寫些短文及趣味性的〈小專電〉之類。越數年調職，改隸編輯部，負責校對工作，與獨鶴先生方始有了每晚見面的機會。〈快活林〉每天刊出諷刺畫（早期尚無漫畫之名）一幅，由馬星馳執筆，署名一個『星』字；這位老先生是山東濟寧人，寄籍上海，單身一個，別無親屬，長年住在一家小客棧裡，除了善畫之外兼亦工書；《新聞報》廣告版的許多廣告木刻，多數出於他的手筆，因此他還兼了廣告校對主任一職。此老染有阿芙蓉癖，體弱多病。當時我少年好弄，偶然也仿效此老的畫筆，——最簡易的是『字中嵌字』以寓諷刺的一種，作爲投稿，在〈快活林〉刊出。後來每逢星馳先生請病假，獨鶴先生不是請丁悚（人稱『江南老畫師』，漫畫家丁聰之父。）代筆，便是命我濫竽充數。我爲〈快活林〉作諷刺畫，用的筆名是『癸弓』二字。（後來星馳先生病故，纔由楊清磬與丁悚輪流作畫，而以楊畫所佔之次數爲多。）」

也是小說家的嚴獨鶴經常發掘優秀的通俗小說，在〈快活林〉連載來吸引讀者。像李涵秋的《俠鳳奇緣》、《戰地鶯花錄》，平江不肖生的《玉玦金環錄》都在〈快活林〉連載，頗爲轟動。當然李涵秋與向愜然的才情橫溢，固然是他們成名的條件，但〈快活林〉無疑地提供了舞台，幫助他們克享盛名，則是不爭的事實。

1929年初，爲了擴大張學良的影響，也爲了張學良與上海新聞界建立更好的關係，報人錢芥塵出面組織了一個「上海報界北方視察團」，邀請當時上海的不少著名報人參加，嚴獨鶴也在其中。在北京，嚴獨鶴看到了張恨水正在《世界日報》上連載的《春明外史》，同時看到了張恨水的作品受歡迎的程度，聽到了北京各階層對張恨水作品的好評，使他頓生將張恨水引薦到上海的念頭。於是他通過好友錢芥塵的介紹，認識了張恨水，便當場邀張恨水爲《新聞報》寫一部長篇連載小說，張恨水也滿口應承。嚴獨鶴回上海後，又寫信給張恨水，連連催稿。對於來自上海的約稿，對於進入上海的第一部作品，張恨水也不敢怠慢，據說，張恨水寫作很少擬寫作提綱，但《啼笑因緣》這部小說，他不但找了人一起商量人物情節，而且還擬了詳細的寫作提綱，終於推出了一部精心力作。《啼笑因緣》自1930年3月17日開始在〈快活林〉上連載後，大受歡迎，獲得了極大的反響，一時洛陽紙貴，當時文壇甚至還出現了各種版本的「續作」。嚴獨鶴在三友書社之後重印《啼笑因緣》的序中寫道：「在《啼笑因緣》刊登的第一日，便引起無數的讀者的歡迎了，至今書雖登完，這種歡迎的熱度，始終沒有減退。一時文壇上竟有『《啼笑因緣》迷』的口號，一部小說能使讀者對於它發生迷戀，這在近人著作中，實在可以說是創造了小說的新紀錄。因爲我恭任〈快活林〉的編者，〈快活林〉中有了一個好作家，說句笑話，譬如戲班中來了個超等名角，似乎我這個邀角的，也還邀得不錯哩。」儘管張恨水在北邊已成爲頂尖的通俗小說作家，但在上海他卻默默無聞。張恨水的得以進入上海，並



且在上海的通俗文學界一炮打響以至於大紅大紫，不能不歸功於嚴獨鶴。《啼笑因緣》成爲最暢銷小說，改編成評彈、說書、話劇、電影。明星和大華兩家電影公司爲了爭奪《啼笑因緣》的攝製權還曾對簿公堂。從此，《啼笑因緣》風靡全國，以至影響達於海外。屢屢再版，至今不絕。

嚴獨鶴不但注重長篇小說，他也羅致兩部連載筆記在《新聞報》刊登，一是劉成禺的《世載堂雜憶》，一是汪東的《寄庵隨筆》。劉成禺早年在湖北經心書院、兩湖書院學習，後曾跟隨辜鴻銘和容閔學習西文，在日本參加過陸軍預備學校，後赴美，入加州大學攻讀，是位文武兼備的人才。他生平交友廣泛，與當時的上層人物大多都有來往，所以他的著作內容廣泛，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。劉成禺自己評價說：「典章文物之考證，地方文獻之叢存，師友名輩之遺聞，達士美人之韻事，雖未循纂著宏例，而短篇簿錄，亦足供大雅諮詢。」而汪東字旭初，號寄庵，爲章太炎弟子，凡經史百家，無不研習，在音韻學、訓詁學、文字學等諸方面，都有創獲。他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、院長。據鄭逸梅說《寄庵隨筆》「所記的，大都是抗戰時期，國府西移，重慶山城的人文之盛，也有一百多則。筆墨風華雋永，更在《雜憶》之上，可惜迄今尚沒有人爲之整輯，附諸印行。」（案：後來已出版）

嚴獨鶴除主編〈快活林〉（「一·二八」事變後，國難深重，無從快活，於是改名爲〈新園林〉。又：《新聞報》增出《新聞夜報》，他又兼任總主筆及副刊〈夜聲〉之主編。）外，並曾徇世界書局之請，擔任《紅雜誌》周刊的編輯主任名義（執行編輯是施濟群），該刊創始於1922年8月，結束於1924年7月，共出一百期。之後改名《紅玫瑰》，繼續發行。《紅玫瑰》共出7卷，第一、二卷由嚴獨鶴與趙苕狂合編，第三卷第一期起由趙苕狂單獨執編，至1932年1月終刊。《紅雜誌》、《紅玫瑰》是二〇年代通俗文學的代表刊物。實際上，嚴獨鶴並不負責這些刊物的具體編輯工作，但他德高望重，這些刊物紛紛以他來增強號召力。在一百期的《紅雜誌》上，嚴獨鶴共計發表短篇小說四十五篇。而長篇小說則僅有唯一的《人海夢》一種，最初發表於施濟群、陸澹盦合編的《新聲》雜誌，之後又在《紅玫瑰》連載，曾出版單行本，但始終未完篇。嚴獨鶴精通英語，早在1915年間，就爲梁啓超主編的《大中華雜誌》譯過不少時政文章。並編過多種英文辭書。他的翻譯小說以《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》最爲著名，該書是由他和程小青、周瘦鵑等十人以文言合譯的，全書十二冊，中華書局於1916年初版，重版達二十多次。

陳蝶衣在回憶文章中提到嚴獨鶴素向伉儷情深，他的夫人是以肺病不治去世，中年悼亡，後與北里紅倌人雪兒產生一段戀情。事情經過是：因嚴獨鶴悼亡，奉倩神傷，便有幾位「狼虎會」（狼吞虎嚥的聚餐會）的會員（這個會是由陳小蝶、李常覺、周瘦鵑、丁悚四人發起，之後陸續加入的有嚴獨鶴、王鈍根、畢倚虹、江小鶴、楊清聲、任矜蘋、周劍雲，都是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士。）提議，把聚餐會搬到會樂里的紫瓊、雪兒的妝閣去舉行，好讓嚴獨鶴也得以稍開眉鎖，略寬懷抱。紫瓊、雪兒是當時上海北里的名花之一，陳定山在《春申舊聞》說：「紫

瓊眉目飛揚，十分雋美；雪兒則守禮含羞，終日手不釋卷。」而親眼目睹的陳蝶衣更說：「（雪兒）是一位標準的靜女，見人只是靦然而笑，不肯輕於啓齒；宛然是《板橋雜記》中的馬湘蘭、李香君一流人物，而不像是十里洋場的鶯鶯燕燕。」只是這一項提議，因江小鶴的反對而取消了。後來聚餐地點改在二馬路飯店弄堂裡的一家同華樓，而採用「飛箋召花」的方式，邀請北里名花前來侍酒。當時所徵召者有號稱為「小四金剛」的張素雲、蔡紫紅、芳卿、雲蘭方；號稱為「五虎將」的高第、葵雲青、琴寓、徐弟、鏡花樓。此外楊清磬又替嚴獨鶴叫了雪兒與紫瓊；江小鶴則叫了雅秋小妹妹。這一晚的琴樽之會，一時絲管嗷嘈，笑語並作。而嚴獨鶴與雪兒初次會面，即一見傾心，在笙歌如沸中喁喁細語，雙方似乎都有「相見恨晚」之慨。


陳蝶衣又說：「雪兒雖然溷跡風塵，馳名花國，卻是個弱女子、病美人；並且和獨鶴夫人一樣，同是肺病患者。獨鶴先生每與雪兒挑燈夜談，敘述為夫人調糜量藥的往事，雪兒往往沾衣助泣，悲不自勝。這樣經歷了一段時期，雪兒因觴政繁忙，疲於奔命，體質愈益衰弱；到了深夜，總不免掩唇而咳，雙頰紅得像抹上一層胭脂；甚至咳到後來，還唾中帶血，這也就是病又加深的徵象了！於是在夜深人靜之時，雪兒假依著公畢後趕來侍疾的獨鶴，不免墮淚如霰，委婉地說出了訣別之詞，許下了來生之願。一番誓言，使獨鶴先生深為感動。有一天晚上，趁著雪兒閉目睡去，便下著決心，悄悄對紫瓊阿九說：『雪兒的病，看來一時難好，我想娶她回去，讓她好好的調養。』紫瓊聞語，既驚且笑，對獨鶴先生說：『儂發痴哉！一個病人，儂討轉去做啥？』雪兒睡去，原是假寐養神，並未入夢；這幾句背後商量的話，被雪兒聽得一明二白，也不免銜感而隕淚，於是過不了幾天，便毅然撤去豔幟，除下牌子；接著，二人的結婚喜柬亦隨即發出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；我也曾登堂拜賀，喝到了他們的喜酒。做了嚴氏婦之後的雪兒，幸賴醫學昌明，肺病有了特效藥，病體居然日漸痊可；這其間夫婿的殷勤調護，自然也耗費了不少心力。我在避地南來之前，曾一度往訪賢伉儷，見到雪兒夫人已面團團如喜姑娘，不再是弱不勝衣的病瀟湘了。」這事在陳定山的《春申舊聞》一書中有〈當年曾唱「雪兒」歌〉一節，記之甚詳。而劉嘉猷也說蝶衣兄所記之紅倌人雪兒，即是師母陸蘊玉女士。她「雖出身平康北里，但毫無風塵氣息，一派大家風範，尤其待人接物，和藹可親，禮數週到，內子有什麼家務事都愛去與師母商量，所以蘊玉師母很受到家人與親友的尊敬。」

五十年代初期，嚴獨鶴和原《新聞報》的一些老報人，在有關領導部門的安排下，離開報社，被集中安置到新成立的新聞圖書館工作，由嚴獨鶴擔任主任。1952年，上海新聞圖書館與鴻英圖書館合併成為上海市報刊圖書館，嚴獨鶴任副館長。1958年10月，上海市報刊圖書館、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、上海市科技圖書館合併到上海圖書館，嚴獨鶴任上海圖書館副館長，並主持《全國報刊索引》編輯及剪報工作。還受命出任過《新聞日報》私股監察人，被《解放日報》社聘為編輯顧問。曾當選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屆人民代表，第三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、上海市文聯委員、中國民主促進會上海市委員會委員。



文化大革命期間，嚴獨鶴幾經抄家，結果抄到一張照片，是嚴獨鶴六十歲生日與門人前《華報》社長朱庭筠等人攝於壽堂的照片，只因該照片有蔣介石所贈「進德延齡」的壽屏，紅衛兵認為他是國民黨的特務，於是進行強迫「交心」，且將種種莫須有的罪名，強栽在他的頭上，如此疲勞轟炸式的「談話說服」，日以繼夜，似乎不達目的，誓不甘休。嚴獨鶴一再地縷述過去的工作情形，以及辦學的經過，同時說明那方賀匾僅是政府對一個新聞從業員工作的鼓勵，如此一遍又一遍的衷心訴說，仍不能使對方滿意，於是他們改變方式，要他寫坦白書，一遍又一遍。嚴獨鶴的兒子嚴祖佑在〈父親嚴獨鶴散記〉文中就這麼寫道：「1968年春，我返滬探親前，設法從農場醫院搞到了一張轉診單，從而得以治療為由，在上海住了好幾個月。此時，一輩子以文為生的父親，一拿起筆，手就要發抖，寫的字也歪歪斜斜，不能成行。他最擔憂的就是圖書館造反派要他一個星期交一篇思想彙報。每到週末，他就害怕，不知下星期如何交賬。好在我在勞改場所已經滾了幾年，對寫這類東西早已駕輕就熟。我在滬期間，父親的思想彙報自是由我一手包辦。至初夏，農場數次來函催我速回，我不得已，只好向父親辭行。父親睜著混濁而充滿血絲的雙眼，孤苦無助地望著我說：『你走了，我怎麼辦呢？』我知道，使父親惴惴不安的還是這每星期一篇催命的思想彙報。於是，我在離家前兩天，將原來寫的思想彙報整理了一番，從不同的角度擬就六、七篇適合不同時節、不同形勢要求的範文，交給他，囑其每星期抄一篇交上去，一個輪番後，再依次周而復始。父親接過這幾張紙，神經質地緊緊攥著，就像沉船上的落水者，抓住僅有的一塊木板。」

其實這時嚴獨鶴患有肝腫病，經過如此折磨，病情益形加重。而最毒辣的手段，莫如通令各醫院拒絕其治療，私家醫生又不敢應診，即令親戚中有願意為其診治的，也無法購到應用的藥品，因此他的肝腫病在醫與藥的雙重杯葛之下，病況越來越重，情緒也愈來愈壞。加上一再重複地寫那坦白書，他原有神經衰弱的舊疾，執筆寫字已顫抖到不能成行。有一天，他吃了早點，又開始寫坦白書，但他的手已無法把穩筆，實在寫不下去了，忽覺頭暈目眩，撲倒在書桌上，這位新聞世界的一代巨子，在1968年8月26日終於「化鶴而去」了。

嚴獨鶴在報界享有很高的威望，是位廣受尊敬的長者。《報人外史》說他：「待人接物，處處慎重，先生天性謹愿，好好先生典型，鑽進新聞圈，一舉成名天下聞，當然知足。對外交際，八面玲瓏，服務《新聞報》近三十年，賓主相得，同事尊敬，友朋愛戴，立身處世像嚴先生般真到處歡迎，滿堂紅人物，爭相訂交，從無仇怨，何怪紫膛臉皮笑眯眯。任事《新聞報》，一帆風順，由副刊編輯而本埠編輯，電訊編輯，副總主筆，一身三要，《新聞報》第一根台柱，求之報人中，像嚴先生般交長生運，常盈無虧的，惟氏一人，別無第二。」誠哉斯言。

延伸閱讀

- 嚴獨鶴（1997）。人海夢。瀋陽市：春風文藝出版社。